

✓
1104



海宁文史资料

第 65 期

纪念宋云彬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专辑

1997 年 8 月

政协海宁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2013/07/01

前 言

今年8月16日是我国著名文史学者、作家、编辑、坚定的爱国民主人士宋云彬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

宋云彬(1897—1979),海宁硖石人。“五四”运动以后,他就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长期在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从事民主爱国活动和出版工作,一直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为我国的民主革命和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

宋云彬先生为人胸襟坦率,敢于坚持真理,待人诚恳热情,一生高风亮节。他曾当选为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代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三、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民盟中央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他历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委员,出版总署编审局一处处长、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1951年调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浙江省文史馆副馆长,民盟浙江省委副主委,浙江省文联主席,省体委主任等职;1958年调回北京任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编辑,并在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兼教。值此宋云彬先生诞辰百年之际,本委邀请他生前友好、同事、亲戚、子女和有关部门撰写回忆纪念文章,以此专辑作为对这位杰出乡贤的深切怀念。

编 者

1997年8月

纪念宋云彬先生

诞辰一百周年专辑

《海宁文史资料》第 65 期

目 录

- 一、深深的怀念
——纪念父亲百岁华诞 宋剑行(1)
- 二、早期的共产党员 著名的文化人
——纪念宋云彬先生诞辰 100 周年 严永顺(8)
- 三、“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忆宋云彬同志 曹湘渠(16)
- 四、《宋云彬杂文集》序 秦 似(21)
- 五、宋云彬印象 章克标(31)
- 六、开明书店的书和人(节录) 章克标(33)
- 七、怀念宋云彬与许志行 王凡西(36)
- 八、磊落一丈夫
——回忆宋云彬同志 王知伊(49)
- 九、宋云彬先生著作简介 虞坤林(51)

深深的怀念

——纪念父亲百岁华诞

宋剑行

我的父亲宋云彬逝世已有十九个年头了。今年8月16日是他的百岁诞辰。自他1979年逝世以来,我不知有多少次曾在梦中与他相聚,多么亲切,但也无比惆怅。他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深深地怀念着我的饱经风霜的父亲。

父亲幼年上学不多,纯属自学成才。我的祖父早逝,留下一家出售作冥锭用的锡箔店。祖母想让父亲这个独生子能继承父业,把店管起来。然而父亲却无心经商。晚间他经常在床头点一支蜡烛读书,至深夜蜡烛点完才闭眼就寝。他很喜欢看新文艺作品,特别是“五四”时期的《新青年》,对他影响最深,使他接触到了新文化、新思想。1921年他24岁时,终于跳出了祖辈在家乡浙江海宁营造的生活圈子去了杭州,先后担任《浙江日报》和《新浙江报》的编辑,并开始写一些散文之类的作品。1924年,在杭州经宣中华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他从杭州到了广州,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任编纂股股长,参加《黄埔日刊》的编辑工作,在那里他认识了周恩来同志。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父亲遂从广州到了武汉,任武汉《民国日报》编辑,并在武汉政治劳动部任秘书。不久,汪精卫也发动“七·一五”政变,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与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合流,屠杀共产党人,父亲也被他们列入了60人的通缉名单之内,于是他离开了武汉,在庐山牯岭停留了20多天后就回到了上海,并在上海安顿下来。

从此他失去了与党的联系。先在商务印书馆担任馆外编辑，做《资治通鉴》的选注工作，后又为开明书店做《开明活叶文选》的选题和注解工作。当时，父亲的老师朱起凤有一部近300万字的大型辞书《辞通》要在开明书店出版，此书篇幅大，内容专，引证繁富，僻字较多，只有通晓古籍的人才能对原稿进行编辑校订。父亲是作者的得意门生，在学问上也能胜任，于是就被聘主持此项工作，父亲也就正式进了开明书店。他本着一丝不苟的精神，在周振甫和卢芷芬先生的协助下，历时三年多完成了编辑校订工作，对原书的分卷和条目次序作了调整，还写了跋，有些内容也作了订正。故《辞通》的得以出版，父亲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同时，他通过这项工作，也加深了自己在古籍研究方面的修养。以后，他参加了开明书店《中学生》杂志的编辑工作，还参与编写了《开明国文讲义》和《开明历史讲义》。开明书店在章锡琛、夏西尊、叶圣陶等人的主持下，积极扶持新文学作品，认真出版教育青少年的书籍，是一家开明、进步的书店，很有自己的特色。父亲自1931年进店至1937年抗战爆发后离开，在稳定的编辑生涯中养成了具有开明书店特色的认真、严谨、热诚、朴实的工作作风。

抗战爆发后，父亲带着我和母亲从上海回到家乡。家乡沦陷，又在难民群里辗转逃难月余，最后到了姐夫工作所在地的湖南衡山，母亲与我在那里安顿下来，父亲则独自去了武汉，在武汉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为郭沫若）宣传科工作。以后从武汉撤退，他又到了广西桂林，与胡愈之、陈劭先等人创办了桂林文化供应社（胡愈之后来未在文化供应社任职），父亲任出版部主任。那时除文化供应社的工作外，他还在桂林师范学院讲课，并参加《中学生》和《野草》两个杂志的编辑工作，相当繁重。《野草》于1940年创刊，任编辑的还有夏衍、聂绀弩、孟

超、秦似等人。父亲本来就十分推崇鲁迅的杂文，参加编辑《野草》后，便促使他写了不少杂文，后来将其中一部分编成《骨鲠集》出版。桂林当时有“文化城”之称，尤其是香港沦陷后，在香港的有些“文化人”辗转到了桂林，使桂林更加活跃起来，父亲参加了不少文化界的社会活动，这是他在抗战时期生活内容最为丰富的一段时间。

1944年秋，日军进攻桂林，我家又从桂林辗转到了贵阳，最后到达重庆，一路极为艰辛。不久，党派张友渔同志来找父亲，说要请他去延安讲授中国文学史。父亲欣然答应，并提出我与母亲也同去延安的要求，张同意了，要我们在重庆等候去延安的车子，因为带着家眷，不便轻易成行。父亲便开始作了一些准备。但等了一、二个月，也没有合适的去延安的车子可搭乘，父亲有些焦急。这时，父亲早年在黄埔军校的同事张今铎听说他在重庆还没有合适的工作，便连连打电报、发快函，约请他去昆明到英国心理作战部任顾问，是个闲职，但可解决战时一家的生活问题。父亲由于对该部的情况不了解，而且又已讲定要去延安，所以不敢贸然答应，于是便将张今铎的来电和来信托人转给周恩来副主席，请他决定是否要去。周副主席约父亲去重庆曾家岩50号谈话，陪同的有夏衍和邵荃麟，周副主席说他了解张今铎的为人，延安既然一时去不成，就去昆明吧，还指示父亲去后应当留意什么。这样父亲和母亲便去了昆明，我则到浙江大学继续上学。因为这是父亲生活中的一段插曲，许多人不理解父亲为什么去昆明当了英国心理作战部的顾问，所以我将经过情况在此作了如上说明。

抗战胜利后，父亲从昆明回到重庆。那时国民党政府一面加紧部署内战，一面又发动和平攻势，局势十分复杂动荡。1946年1月，民主同盟中央在重庆创刊《民主生活》，由父亲任主编。这是一个周刊，父

亲既组稿又编辑校对，还写社论，他全力以赴，很是繁忙。到该年4月，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形势已十分明显，《民主生活》也被迫停刊。于是父亲又回到桂林文化供应社任总编辑。不久，昆明发生了国民党特务暗杀李公朴、闻一多血案，全国一片白色恐怖，父亲遂到了湖北大冶（那时姐夫和我都在大冶工作，母亲也在那里养病），在家编写《中国近百年史》。1947年，他去了香港，担任香港文化供应社的总编辑，并参加民主同盟在香港的种种活动，还在香港达德学院教课，继续编写《中国近百年史》，又为上海书店编写南洋华侨学校的语文教科书。

1949年初，中央统战部约请父亲等一批在香港和上海的民主人士去北京参加工作。3月，他与陈叔通、郑振铎、叶圣陶等数十人由香港启程搭乘英国商船到山东，然后到北京，任华北政治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委员兼编辑。9月，被推为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出席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出版总署编审局后，他任第一处处长。后又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

1951年10月，父亲被调往杭州，任浙江省政府委员、省文联主席、省文史馆馆长、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中国民主同盟浙江省副主任等职。1954年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在杭州期间，父亲挂职不少，环境变化较大，要处理的关系也较复杂，像他这样比较单纯的“文化人”可以说是难以胜任的。所以他虽然努力工作，但心情并不很舒畅，对有些事情他有不同的看法，但要改变状况却很困难，因此他不免有些意见。1957年整风开始，他便被作为首批对象进行批判，带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1960年10月摘帽，1979年2月按“错划”得到改正）。

反右后，他决心发挥自己的所长，潜心搞整理古籍的工作，于是

写出自己的工作计划，上报有关部门。那时，中华书局正在筹划组织“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周总理得悉父亲有整理古籍的打算后，便通知有关部门将父亲调到北京中华书局参加点校“二十四史”。父亲负责点校的是《史记》和《后汉书》，同时，还在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授课。1959年，他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三届连任，直到逝世。父亲搞“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真是全身心地投入，孜孜不倦，连星期天与晚上也不休息，对这项工作他怀有极大的兴趣，同时也想在有生之年多做些实实在在的工作。可是到1966年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父亲又遭受到了很大冲击。那时我们做儿女的都不在他们身边，无法照顾。有一天晚上，“造反派”带红卫兵去抄家，并对父母百般凌辱，父亲曾对母亲说：“与其这样活着，不如我们一起死了算了。”这时母亲却坚决地说：“不能死，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如何向儿女与亲友们交待！”母亲虽然是文化程度不高的旧式家庭妇女，但在关键时刻却很清醒，真是父亲的贤内助。1969年初，父亲被送往文化部在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那时父亲已年逾古稀，身心也已极度疲惫，在干校被安排看鸡鸭、扛大粪，其艰难处境是可以想见的。1970年，他在干校病倒了，患的是黄胆性肝炎，由姊姊的儿子去领回北京。病虽然是治好了，但人也已完全丧失了工作能力，连写信也很困难了，整日闭口无言。当中华书局再次送来一部分“二十四史”点校的复审工作时，他已完全无能为力了。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父亲从广播中听到公告后伤心落泪。1976年11月3日母亲病逝，他也默默流泪。这是我们见到的他两次伤心落泪。1978年全国政协开会时，他虽由我儿子照顾去参加了，但他已发不了言，连走路也很困难，这是他最后一次形式上的参加国家政治活动。1979年4月17日，他病逝在医院，永远地离

开了我们，那年他 82 岁。

父亲一生孜孜不倦，勤奋好学，勤奋工作，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全凭刻苦钻研，自学成才，终于成为颇有名望的文史学家、作家与资深编辑。父亲记忆力强，思维敏捷，文笔流畅，写作时构思成熟，便握笔写来，一气呵成，很少涂改。有人形容他“文思潮涌，下笔有神”，能做到这一点，要靠深厚的功夫。

父亲平时做事从容不迫，谈话娓娓动听，又带几分幽默，常常口衔烟斗，有时还带一支手杖，神态潇洒，颇有些名士风度。他胸襟坦白，宽厚大度，待人以诚，但他针砭时弊，嫉恶如仇，在原则问题上是非分明，毫不含糊。他生性耿直，不会见风使舵，有时不免令人不悦，以恶言回报，他也坦然处之。父亲一生交游颇广，很有几位与父亲情谊特深，可以推心置腹。父亲与人交往，本着“君子之交淡如水”，只求坦诚相见，不论地位高低，不问名声大小，一视同仁，绝无市侩气。他喜欢与朋友对酌畅谈，无拘无束，古往今来，引人入胜。他对子女的教育大都在欢谈笑语中进行，而不是板起脸孔来说教。在家里很有民主作风，他尊重大家的意见，而不以父辈身份唯我独尊，固执己见，因此，他得到我们由衷的敬爱。

父亲早年曾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炽烈的革命环境中奋斗过一阵，虽然在第一次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下失去了与党的联系，但他始终热爱党，热爱党的事业，坚持为发展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事业而勤恳工作。他积极参加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新中国的成立使他欢欣鼓舞，他也受到党的信任与很好的安排，因此他一心一意地用心学习，努力工作。他也常常畅所欲言，不怕招怨，不怕贾祸。后来虽然在反右运动中遭受冤屈，但他只对自

已进行检查、总结，在我们家人面前从未有不满发泄。回到北京进入中华书局从事古籍整理后，他振作精神，全身心地投入而乐此不疲，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断了他的工作，以后又因病而完全丧失了工作能力，因此可以说他是以毕生的精力投入了进步的文化事业。

终其一生，父亲是一位正直、温文尔雅的知识份子，是一位爱国、爱党、进步，并作出过贡献的民主人士。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份子中，类似父亲这样的为人与经历的何止千万，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

(1997年7月)

早期的共产党员 著名的文化人

——纪念宋云彬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严永顺

在宋云彬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市政协文史委约我写一稿，谈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宋云彬，特别是1925年在硖石东山召开的“东山会议”与云彬先生的关系。“东山会议”距今已有72年，参加会议的人都已谢世，留下的资料甚微。现从征得的资料、挖掘云彬先生引荐“全省各县市党部联席会议”来硖石东山召开的思想基础和他的文学基础，简述以下四个方面。

（一）一个自学成才的专家

宋云彬先生，于1897年8月16日出生在海宁县硖石镇的一个商人家庭，因自幼丧父，家境日趋破落贫寒。他从未进过什么名牌大学的文科，但他的国学根底造诣极深，尤以史书研究更精。他的学问是从哪里来的呢？主要是靠他长期的刻苦钻研自学和工作实践而获得的。说到“学历”，云彬先生没有大学文凭，只是在家乡硖石米业小学堂毕业，后又在杭州崇文中学念过二年中学，不久因病辍学。因此说，他相当扎实的“古文基础”是在“小学堂”里奠定的。

云彬先生的少年时期，处在清末民初，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既经废除，各地大量设立“学堂”。那时启蒙小学堂已不念什么四书五经，而是采用“国文”、“历史”、“算学”、“修身”等教科书。但是毕竟“去古未远”，对于“国文”是特别重视的。国文教科书中，还选了不少《论语》、《孟子》、《史记》、《汉书》中的片断和汉、魏、唐、宋的诗文。云彬先

生在米业小学堂读书时，特别喜爱国文，并受到该校国文教师朱起凤（字丹九）的启蒙教育。

提起朱起凤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他虽仅中过“秀才”，但真才实学和见解，却远远超过镇上的“举人”老爷。朱起凤先生对中国文字的复杂性研究很深，中国文字有一字数音；有一音数字；有同音借义，有谐音借义；有同一文字而用法不同含意不同。不是博览群书，通于六书假借的义例，是很难读懂弄通古书原委的。少年时期的宋云彬，得到这样一位博闻强识而又诲人不倦的名师，为云彬先生攻研国学史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后他出任报界编辑，从事写作多年，经常系统地勤奋阅读《史记》、《汉书》，以及许多文学历史方面的古籍巨著，深夜勤读，深入研究，下功夫分析，用唯物主义观点，分辨功过是非，肯定功绩，去除糟粕，一生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成为著名的文史学专家。著作有：《明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简编》、《东汉之宗教》、《玄武门之变》、《中国近百年史》、《陶渊明》、《玄奘》、《王守仁与明理学》、《康有为》等书，这些卓著的成就，在文化知识界有很深的影响。这里值得一提的是：1930年朱起凤先生的巨著《读书通》送到上海开明书店，开明特请朱起凤先生的学生宋云彬专任编校，云彬先生注释、校订，并写了跋，书名易为《辞通》，越三年之功，于1934年出版发行。这本《辞通》与《辞海》、《辞源》三书齐名，成为我国有名的三大辞书之一。

（二）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云彬先生是一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抗战时期，曾辗转武汉、桂林，在桂林出任中国文化供应社出版部主任，与文化名人夏衍、秦似、聂绀弩、孟超等一起，共同编辑出版文艺杂志《野草》。建国后，曾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代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政协第三、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民盟中央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1951年调回故乡浙江,又历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浙江省文史馆副馆长、民盟浙江省副主委、浙江省文联主席、省体委主任等职。这些都是大家所熟知的。但是对于云彬先生在青年时期,还曾参加过共产党,并为国共两党合作,作出过重大努力和功绩的经历,可能了解较少。

云彬先生的青年时期,是我国政治历史发生大变动的时期。早在1919年中国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他就接受了民主革命的新思想,又经常努力地阅读陈独秀编的《新青年》和《响导》等进步刊物。特别是1921年后,经人介绍,云彬先生先后到《杭州报》、《浙江民报》、《新浙江报》等报社担任编辑,在此期间,每天要撰写社评,更多地触及了政治。青年的宋云彬,觉得自己还缺乏政治上的明确见解;写评论需要观点和见识,新思想正符合青年云彬先生的需求,于是他更奋发学习《新青年》和《响导》等进步书刊,应用里面的唯物主义观点,面对现实、抨击洋鬼子的侵华和军阀政府的腐败,揭示人民所遭受的灾难祸害等。写出的社评,登在报上,很受读者欢迎。由于经常发表文章,逐步成为杭州城里赤色思想的激进派。

1924年1月,广州国共合作后,中共杭州支部,受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的领导,正在积极扩大党的队伍,努力推进国共两党合作。此时,宋云彬结识了杭州政法学校教师安体诚。安体诚是1923—24年间的中共杭州支部书记,浙江早期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人。安从云彬先生所发表的文章上面,了解到云彬先生是一位有为、思想进步的知识青年,党正需要这样的人才,所以安体诚多次找云彬谈话,启发他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云彬先生受到启发和教育后,认识到党和刊物上所指的路,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讲,是多么的需要,是一条光明大道。逐步理解到中国的贫穷落后,主要是由于外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

内部军阀割据混战而成，萌发了国家要兴旺，人民要安宁，必须赶走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的思想，滋长了一种正义感。1924年8月，在宣中华、安体诚的介绍下，云彬先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位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早期的共产党员。

(三)参与筹组国民党海宁县党部

宋云彬加入共产党组织时，正是国共两党合作时期。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帮助组建、发展国民党。宣中华从莫斯科回国后，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参加了国民党，并接受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指派，在杭州做筹组国民党浙江省各级党部的工作。宋云彬在宣中华的领导下，在浙江临时省党部内工作，也参与做各县市筹组、建立党部的工作。此时，浙江属军阀孙传芳统治，国民党活动不能公开。各县市发展国民党员，筹组国民党党部在秘密或半公开下进行（为什么能半公开，因为孙传芳没民心，老百姓拥护国民革命）。1924年下半年，杭县、萧山、宁波、绍兴四个县市临时党部先后成立，海宁、平湖、临海、永嘉等县也派出了筹备员。海宁的筹备员就是身为共产党员的宋云彬。

宋云彬在海宁筹备、组织县（临时）党部，有个过程。他首邀海宁国民党元老、在教育界有一定威望和影响的朱尚（字苍）出面发展党员、组织党部。而朱尚在当时何以有如此胆识和远见呢？用詹秉文的话来说：这不能不归功于共产党员宋云彬。

宋与朱的交识，最初是在朱尚创办的《海宁教育》之时，宋是主要的撰稿者，且有很多新的见解，论断又非常精辟，所以早为朱所钦佩，而终于结为莫逆之交。宋的那种进步思想给了朱非常深刻的影响。特别是1924年春，朱尚在杭州看病，经宋云彬、吴文祺的介绍，使朱尚看到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以及《中

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著作和文献。这些对于朱尚的思想影响极为深刻。此时，宋云彬委托朱尚回海宁先发展国民党员，为筹组海宁党部作准备。朱尚回海宁后，就在教育界这块阵地上，率先宣传和发展党员。1924年暑假，利用小学教员讲习会，抓住这个恰当机会，事前与主办讲习会的负责人洽商妥当，由朱尚、宋云彬、詹秉文各自准备好选题，负责宣讲。讲的内容有：关于孙中山先生“知难行易”学说的简明道理；关于“三大政策”的重要意义；打倒列强和坚决废除不平等条约等重要道理。通过这些宣传，教育界要求入党的人数逐步增多。后来他们回到各自区里，多数又成为带头宣传和征求同志入党的积极分子。云彬先生领先在硖石建立了第一个区分部；尔后，盐官（城区）、城东、长安等区分部也相继成立。在各区党部活动的基础上，是年9月16日（农历八月十八），国民党浙江省临时党部负责人沈定一（玄庐，当时也是共产党员）来海宁观潮，由宋云彬、朱宇苍等人接待，不久，国民党海宁县临时直属党部成立。

这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吴佩孚的北京政府，电邀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和平统一大业。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决定北上，发表《北上宣言》，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运动，浙江各地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纷纷成立，军阀势力受到打击，国民党活动逐步走向公开化。海宁的国民党组织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925年4月，国民党海宁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海宁县城（今盐官镇）孔庙旁的明伦堂召开，临时省党部负责人沈定一到会指导，会议选举朱尚、宋云彬、姜冰心、苏静安、周燮商、张貽秉、沈锡九为执行委员，国民党海宁县党部正式成立，直属浙江省临时党部领导。

此时，由于孙中山先生的逝世，国民党内左右派的斗争，日趋白热化：一批国民党元老反对国共两党合作，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

工”三大政策。浙江也出现明显的左右派斗争：以沈定一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代表地主买办利益，排共反共；以宣中华为首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从人民革命利益出发，坚持国共合作，维持中山先生创导的“三大政策”。海宁县党部，由于宋云彬的关系，坚决站在宣中华一边，是左派县党部，坚持国共两党合作，维护“三大政策”。这年冬，12月中旬，全省各县市党部联席会议，即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会议，就齐集在海宁召开，这与宋云彬的引荐关系密切。1926年3月，以宣中华为首的国民党浙江（左派）省党部在杭州头发巷宣布成立，使沈定一为首的小车桥（右派）省党部陷于沦落，各地党部（包括海宁县党部）都与头发巷（左派）发生关系。同年8月，召开国民党海宁县第二次代表大会，宋云彬应共产党组织的安排，赴上海国民通讯社任社长，而辞去本届执行委员之职，由此看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海宁筹组国民党（左派）县党部，推进国民革命运动，与宋云彬的进步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四）“东山会议”的召开

“东山会议”为何到海宁来召开，是与宋云彬有着密切关系的。“东山会议”全称是“国民党浙江省各县市党部联席会议”，因为在海宁硖石镇东山召开，故史称“东山会议”。“东山会议”是因针对“西山会议”而开而得名的。“东山会议”与“西山会议”之间存在着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5年11月23日，国民党极少数右派元老林森、谢持、邹鲁等，不经广州中央批准，擅自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先生灵前；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史称“西山会议”。会议发表“对时局宣言”，议决“取消共产派在本党（国民党）党籍案”、“顾问鲍罗庭解雇案”等，公开排共、反共，分裂国民党，违背孙中山先生所创导的“联

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阴谋企图以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的国民党组织为基础，在上海另设国民党伪中央，与广州中央分庭对抗。

浙江，沈定一（玄庐）不顾左派同志的反对，擅自参加了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的所谓“一届四中全会”（即“西山会议”）。回浙后，随即开除了浙江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中的共产党员宣中华、安体诚、俞秀松、倪忧天、唐公宪等人的国民党党籍，并开始筹备他那排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参加的所谓“浙江省党部”。

此时，为了粉碎国民党右派的反共分裂阴谋，宣中华召集宋云彬、顾作之、唐公宪、孙斌等人讨论，说到“玄庐要反党（共产党）了，我们也要召开一个会议（左派会议），即浙江省各县市党部联席会议，以挫败沈玄庐反共、排共的分裂阴谋。”会议到哪里去开呢？在宋云彬同志的建议下，到海宁县硖石镇东山来召开，以示与“西山会议”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一建议得到全体与会者的赞成。并确定以国民党嘉兴县党部的名义发出邀请，由宋云彬、顾作之、唐公宪三人为“东山会议”的筹备负责人。

1925年12月15日，“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各县市党部联席会议”即“东山会议”，在共产党员、时任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宣中华的主持下，在海宁县硖石镇东山脚下“婴求社”（俗称“乌会，即原国民党海宁县硖石区党部所在地）召开。

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来自全省各县市党部中的共产党员或国民党左派代表几十人。据现已查明的：有国民党临时省党部执委、共产党员宣中华（主持人）；临时省党部候补执委、共产党员唐公宪（会议筹备人员之一）；嘉兴县党部执委、共产党员顾作之（会议筹备人员之一）；海宁县党部执委、共产党员宋云彬（会议筹备人员之一）；杭县